

执行编委：陈 辉 田 靖 郭 强 马进平 杨松岩
特约编辑：陈 芳
责任编辑：郭 强
责任印制：张 翔

(京)新登字151号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汉书故事选

编 著：钟岱 肖丹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3号
印 刷：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 本：787 × 1092 1/32
印 张：7.5 字 数：162千字
印 数：0001—10000册
版 次：1991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 S B N 7—5077—0048—8/G·34
定 价：3.20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赫赫汉朝 杰出史篇

距今二千一百年前，时令正当冬季，在今陕北黄陵县桥山黄帝陵脚下，一天，从东北方向潮水般涌来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尘沙蔽天。只见队伍前头，众人簇拥着一辆黄盖大车，用四匹毛色有如棕红缎子般闪光的骏马拉着，车前车后旌旗飘动，好不威风！透过车窗悬挂的珠帘，可以看到里面坐着一位相貌威武、器宇轩昂的帝王——他就是汉武帝。原来，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正由群臣随从，前来这里隆重祭祀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汉武帝的大队人马是刚从北方边境开过来的，有十二位将军带兵跟随。武帝是用雄壮的军威，向匈奴单（chán婫）于显示汉朝的强盛。当时，武帝刚刚平定了南越与东瓯，他自觉功名盖世，才作这次大规模的出巡。他回到长安后，歇息不久，正当早春来临，他又东巡到泰山封禅。之后沿渤海边，到碣石、辽西，再从北部边境，经过九原回长安，行程达一万八千里。当时，汉朝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每年从关东经漕运载到京师的粮食增加几百万石，附近的谷仓都堆满了……这一年，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是汉朝鼎盛的顶点。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朝代。正如一个人有他最充满活力的青年时期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在西汉，也处在各

方面都出现蓬勃生气的上升时期。西汉时代造就出大批大有作为、叱咤风云的有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奋斗和遭遇，在二千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感奋，使你不得不时而为他们的机智勇敢而拍案称快，时而为他们的困苦磨难而扼腕叹息，时而又为他们的成败荣辱中所揭示的深刻哲理而掩卷思索。

今天的华夏子孙，又都为祖国辽阔的疆域而自豪，阅读汉朝历史便可明白，祖国的版图就是在汉武帝时代基本奠定的。这正是汉朝雄伟国力的一个明证。我们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汉族，也是在西汉时期形成的，还直接用了这个强盛的朝代名作为民族名。汉朝的国都长安是举世有名的大都，汉朝开通的“丝绸之路”享誉中外。今天所有的华夏子孙，无不熟悉“汉唐盛世”的说法。这表明西汉和唐朝作为中国封建时期两个最强盛的朝代，早已成为定论，前后互相辉映。

我们这本故事书，就是讲西汉著名人物奋斗的业绩，再现当时人们奋斗的场面和遭遇。西汉的成就和人物活动，早已被东汉初年的大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完整地记载下来。阅读这些丰富多采的历史故事，可以使我们开阔心胸，丰富情趣，并从中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增长我们的智慧。这里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将西汉230年的历史，分为开国、上升、鼎盛、中兴、衰亡五个阶段，作一简述。

开 国

（从反秦起义到高祖十二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195年）

公元前221年7月，反秦战火迅速在全国各地熊熊燃起。这时，东南地区沛郡（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一带出现了一支起义新军，战旗上醒目地绣着“刘”字。随着它在今天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一带作战，势力逐渐强大。这就是农民战争领袖刘邦率领的队伍。刘邦的义旗是在沛郡树起的，这一天，起义民众举行了庄严的祭祀宣誓仪式，拥立他为“沛公”。当时，紧挨在刘邦身旁，站着萧何、曹参（shān申）、樊哙三人。萧何是沛县狱官，曹参是县里负责文书的官吏，樊哙是本地有名的勇士。他们与刘邦是同乡，又是最早共同起义的人物，对刘邦忠心耿耿，或是以老练的办事经验，或是以超人的勇敢，为刘邦开创帝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第二年正月，刘邦又得到谋士张良，以后对许多重要事件，他都为刘邦出谋划策，成为刘邦倚为臂膀的智囊人物。

公元前208年秋天，刘邦在各路起义军中发挥卓著作作用的机遇到了。当秋天来临，起义军阵营决定派遣一支队伍向西进攻，夺取秦朝京城所在地关中地区。此时起义军将领项羽、刘邦、吕臣等人都在楚怀王的指挥下。这位“楚怀王”是原楚怀王的孙子，因为在老百姓中有号召力，被起义民众拥立为楚怀王。在决定派谁进入关中时，楚怀王身边的老将们一致举荐刘邦，他们仗义直言，都说项羽为人残暴，攻襄城时，把全城人杀尽，所到之处几乎夷为平地。因此，关中地区需要派宽厚的人去，那里的父老乡亲深受秦朝的虐待，如果派去的将领能得民心，关中各地便会很快归降，沛公是个

能安抚人心的人，派他前去最合适！

这个决定对刘邦是个绝好机会，项羽被留在函谷关以东，刘邦从此在政治上占据优势。经过他艰苦的战斗，从碭山（今安徽碭山，碭音档）出发，由杠里、昌邑、陈留、颍川等地曲折前进，来到南阳郡（今河南南阳）。郡守（qí奇）据城扼守，攻不下来，怎么办？刘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说服向起义军投降，封他为侯，让他仍任郡守。这一着取得了大成功，南阳郡下属各县都争着向沛公投降。

沛公及时向部下申明严格的纪律，不准卤掠。至八月，刘邦攻下武关，又成功地打进秦皇朝的心腹地区关中。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来到咸阳（今陕西咸阳）郊外霸上，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并将秦朝国家府库一一封起来，防止盗失。刘邦还向关中父老颁布约法三章，废除秦朝残暴苛刻的法律。老百姓欢天喜地，争着向刘邦的军队献上牛羊酒食，唯恐刘邦不当王。

项羽听说刘邦已经平定关中，不禁大怒，便向西攻入咸阳。他仍旧用一贯的残暴手段，大肆杀戮，放火烧毁秦朝宫殿，使热闹的城镇顿时变为废墟。从此项羽彻底失掉民心，虽然他还在东征西战，指挥打仗，但是刘项两家之间胜败的大局实际上已定下来了。项羽违背楚怀王早已立下的誓约：“先入关中者为王。”他怨恨楚怀王不先派遣他入关，便抛弃这番誓约，根本不把楚怀王放在眼里，说：“天下是我项羽和将领们打下的，楚怀王还不是靠我项家叔侄立起来的，他有什么资格主持盟约！”于是他来个大封天下，形成十八个王并立的局面，自封为“西楚霸王”。项羽这样做，又回到分裂割据的老路。项羽最费尽心机的是如何打击刘邦。他先改封刘邦为“汉王”，又把他赶到汉中、巴、蜀一带偏僻的角落，将原来

关中地区分封给秦降将章邯等三人，用他们监视刘邦的行动，堵住他的出路。

刘邦呢，他听从萧何、张良的计策，徙到汉中，先避开项羽的锋芒，又烧掉关中至汉中的栈道，表示自己无意东向与项羽争天下，使项羽失去警觉。之后采用韩信对策，秘密地从故道进入关中，打败章邯，重新占据关中。又经过了四年的战争，同项羽在中原反复较量。刘邦曾在彭城（今徐州）被项羽打得大败，退到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东北、西北）。由于得到萧何从关中运来的粮食和韩信收集的兵力补充，才重整了旗鼓，与项羽长期对峙。刘邦有效地联合了韩信、彭越、黥（qíng晴）布以至北燕的势力，在军事上逐渐转为优势。公元前202年，刘邦的军队与韩信、彭越等会合，包围了项羽的军队，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将他最后打败，项羽则退到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了。

这一年六月，刘邦登上帝位，是为著名的汉高祖。在摧垮了秦朝的暴虐统治之后，他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西汉”的历史。这时，国家得到了和平与安定，然而反秦战争连续八年的破坏，使社会就像一个危重病人一样。人口大量死亡流散，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投机商人趁物品匮乏之机，囤积居奇，致使物价暴涨，一石米一万钱，国家府库四壁空空，百姓家里一贫如洗，连皇帝刘邦出行，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车，有的将相大臣只好坐着牛车出门。

刘邦在战场上富有谋略，善于从大处把握战争形势的发展。如今面临着国家残破的局面，他又懂得及时采取对策，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他长年征战，原来最讨厌儒家，现在却懂得利用儒学作为巩固政权的手段。谋士陆贾不怕触怒他，大

声同他争论，提醒他：“马上得了天下，不能靠马上治理。不要忘记秦朝暴虐而致灭亡的教训，应该提倡仁义，用‘文治’的办法安天下。”刘邦受到陆贾顶撞，却不去考虑自己面子过不去，而当即肯定陆贾讲的有道理，让他著《新语》一书，总结秦朝为何灭亡的教训，汉朝为何兴起的原因。陆贾著书反反复复讲废除暴政、减轻刑罚和剥削、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道理，这一套便成为汉初立国的指导思想，由汉高祖奠基，此后在五、六十年间一直执行下去。

刘邦还果断地采取了恢复生产的措施。公元前202年他即皇帝位后，连续颁布诏令，作出了几项有力的规定：一，罢兵归农，按功劳大小赐给他们田地、住宅，从事生产。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所有军吏卒无罪的，凡是无爵者一律进爵为大夫，原是大夫的进爵一等；并一律免除这些人及全家的徭赋。二，号召在战争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原来的爵位、田宅，重新成为国家编籍内的民户，从事生产。三，因为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民。四，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规定他们只能有较低的社会地位，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官。五，减轻田租，按收成的十五分之一交租税。六，命令丞相萧何制定比秦朝法律较为缓和的九章律，代替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

这些措施有效地促使农民到土地上从事生产、增强劳动兴趣，打击奴隶制残余势力，为汉初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汉高祖以前在战场上因势利导的风格，如今运用到治理国家上来，同样取得了成功。汉高祖还采取了另外两项巩固皇权的办法。一是命令儒生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制止了原先群

臣争功无所顾忌的混乱局面，明确了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二是打击异姓诸侯王分裂势力。在反秦起义过程中，原先六国的旧贵族分裂割据势力曾经重新抬头，西汉朝廷为了维护统一局面，对他们加以扼制。如把齐的田氏、楚的昭氏、屈氏、景氏，以及燕、赵、魏之后，迁到长安附近，使他们离开长期盘踞的故地，无法兴风作浪。

当时还有“异姓诸侯王”的严重问题。刘邦作为大政治家，在楚汉战争中就认识到：分封诸侯王不利于统一。但在当时，为了满足各地拥兵自重的势力分封的要求，调动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项羽作战，他又不得不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其中有韩信、彭越、英布等。西汉建国之后，这些异姓王专制一方，权重势强，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汉朝廷的离心倾向，成为统一的隐患。这时刘邦采取了断然手段，逐一消灭异姓王的势力。同时，刘邦担心无法直接控制全国，又在异姓王的国土上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来卫护朝廷。这样一来又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以至在此后几十年中间需要加以解决。

上 升

（从吕后秉政到文帝、景帝时期，公元前194——公元前141年）

刘邦病重时，吕后在病榻前急切地向他询问如何安后的良策。吕后问：“陛下百年之后，等丞相萧何死了，谁可以代他？”高祖答：“曹参可以。”再问：“到曹参死后呢？”答：“王陵可以。但他太憨厚，应该有陈平辅佐他。陈平很聪明，但难以独当重任。周勃为人忠厚刚毅，文墨不多，但要捍卫刘家天下，必靠此人，可以让他任太尉。”吕后还想再问往后

怎么办？刘邦说：“再往后的事，你也未必能见到了。”刘邦的知人善任和政治远见，被以后的史实所充分证明。

刘邦死后，惠帝刘盈继位，他当时才十七岁，性格懦弱，政权完全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当政十五年，她忌妒心很强，性格残忍，毒死赵王如意，又残杀其母戚夫人。她还玩弄权术，大封侄子吕禄、吕产等为王。这些都是她作为统治阶级人物权力欲和狠毒性的恶劣表现。但从政策措施的大局看，吕后秉政期间先后任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人为丞相，执行的是刘邦确立的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既定政策。当时有歌谣赞扬萧、参二人治国：“载其清静，民以宁壹。”就是称颂两位相国实行清静无为的方针，老百姓得以安心从事生产。

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废除一人犯罪杀尽三族的残酷法律，又宣布取消秦始皇颁布的百姓家中私藏图书有罪的旧法令，还避免了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当时冒顿单于自恃武力强盛，藐视西汉建国未久，缺乏军事实力，写信对吕后恶意侮辱。大臣樊哙声称，派他带十万大军便可横行匈奴境内！中郎将季布反驳说，国家正在医治创伤，派大军作战是动摇天下，斥责樊哙当面欺骗。吕后采纳了季布的正确意见，暂时忍辱，继续与匈奴修好。

因此，在吕后秉政时期，西汉国力继续得到有效恢复。古代史家也称赞说：当时天下刚刚从大乱中摆脱出来，需要无为而治。吕后称制，大政方针都在房间里决定，而海内安定，刑罚大量减少，民众安心生产，经济有效地恢复，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了。

公元前180年，吕后死，把握着部分大权的吕姓诸王一时失去依靠。于是，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周勃、王陵、陈平、陆贾、刘章等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当皇帝，

是为汉文帝。他在位23年，后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近四十年间，是西汉历史的重要时期，国家政治比较清明，生产继续恢复，为汉武帝的鼎盛局面奠定了基础，史书上称为“文景之治”。

古代史家把汉文帝看作理想的皇帝，是有一定道理的。汉文帝的政治性格很有特点。他来自条件艰苦的代国，对民情了解，重视农业，在位期间，连续发布诏令，劝民从事农桑，让地方官趁农时督课耕作，不许大兴劳作影响生产。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二年，下令减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下诏免除全部田租，责令官吏减轻徭役以便民。废除一人有罪，把全家籍没为奴婢的“收奴相坐律”，废除指控别人有不满言论的“诽谤之罪”，废除残害人肉体的肉刑（割鼻子、砍腿骨及宫刑之类），当时有统计，全国范围判重罪的仅止四百人。所以历史学家称赞说：刑罚大省，几乎搁置不用。文帝出身代王，来自山西北部边境，对于匈奴的威胁有充分了解，他一方面重视加强武力防卫，曾计划亲自带兵与匈奴作战，另一方面又认真实行“和亲”，避免了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文帝还重视纳谏，上朝时，遇到有最下级的官员郎或从官上书，他都让辇车停下来接纳，讲得对的采纳，讲得不对的也给以鼓励。所以文帝一朝出现了贾山、贾谊、晁错这些敢于直言的人物。他去细柳营（今陕西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视察周亚夫的军队，被严格执行军营规定的卫士拦阻，又限令他在营中不得骑马驰驱，周亚夫见皇帝时只行军礼，不跪拜，对于这些，文帝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连连称赞他是“真将军”！文帝又讲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苑、车骑等，都没有增加。有一回，他打算建一座露台，叫工匠来计算，需费一百金，文帝便说：“百金等于是十户中等人家资产的总和，不

能建！”他本人平常只穿黑色绋袍，他所宠爱的慎夫人也只穿较短的衣裙，不让拖地，帷帐上不加彩绣，表示带头实行俭朴。当然，汉文帝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的薄刑罚有的只停留诏令文字上，而实际上却每有轻刑重判。当时藩国势力膨胀，他未能果断打击，在淮南王刘长谋反事发之后，他还分封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王，这留下了后患。但是总的来说，文帝的政策对于汉朝继续走上升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史书上称赞当时的社会情况时说的：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风俗笃厚，户口滋息。

汉景帝时期，继续执行休息民力的既定政策，规定收田租“三十税一”，成为汉朝的定制。并且进一步减轻刑罚，采取措施削弱骄扬跋扈的诸侯王国势力，采用晁错的计划，逐一削减楚王、赵王、胶西王的属郡。这时，吴王刘濞（bì必）就联络楚、赵等六国，发动叛乱，这就是“七国之乱”。汉朝廷依靠梁国在中原地带坚守和大将周亚夫的进击，在三个月内平定了叛乱。随后，汉景帝降低了诸侯王的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理境内人民。从此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诸侯王强大难以制服的局面大大缓和了。

鼎盛

（包括武帝在位的56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是汉武帝时代国家强盛的顶点。当年武帝二十八岁，登位已有十二个春秋，正处在积累足够经验，富于开拓进取精神，又充分自信的时期。他日思夜想，奋发有为，建立赫赫功业。他一心广延人材，于此年又第三次大规模地向天下征举贤良直言之士。诏书颁发后的一天，刚刚黎明时分，在宫廷大门外就来了三个英气勃发的

士人，等待宫门一开就把奏书递上。汉武帝坐在宫中大几案前，命人把奏书打开，先看他们的名字，原来是来自山东的主父偃、严安，和来自河北的徐乐。汉武帝一口气阅完这三篇奏书，心中大喜，当天上午便召见他们。三人所谈，主要是劝武帝深刻记取暴秦由于连年征伐、刑罚残酷、剥削无度而灭亡的教训，防止汉朝土崩瓦解。在谈话中，汉武帝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激动，大声地感慨说：“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他深深为有才能见识的人材久被埋没而惋惜，更为三人眼光的远大、议论的深刻而欣喜。三人当即拜为郎中，主父偃还一年四迁，严安被拜为骑马令（主管天子骑乘所用马匹），官阶虽低却是皇帝近臣。

在此之前，武帝提拔了儒生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武帝还一再破格任用人材，既表现出他求贤若渴，又反映了这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对各种贤能之士的急迫需要。由于武帝和当时的俊异人物共同建树功业，把西汉社会推向鼎盛的阶段。

汉武帝的功业，建立在汉初以来所累积的雄厚的经济实力上。汉兴至此六、七十年，经过文景之治，生产大大发展，财富充足。据史书记载，同汉初经济凋敝不堪的局面形成天壤之别。至武帝初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灾害，则百姓衣食充足，各地城邑谷仓堆满，府库里财物充溢。京师国库里储存的钱币达数以万万计，因积存时间太长，贯串铜钱的绳索都断朽了，散成大堆无法计算。国家大谷仓的粮食年复一年地堆积，仓里都装满了，只好堆放在外面露天地方，由于粮食贮存时间太长，以至糜烂无法食用。在街头巷尾，到处有老百姓喂养的骠壮的马匹，田野阡陌之间更是成群结队。马匹一多，甚至形成了新的例俗：乡间和集镇的男子聚会游玩，谁骑母马来就不被欢迎，被撵出队伍之外……

就在这雄厚的物质基础上，汉武帝时代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史书上说他雄材大略，兴建制度，号令文章，焕然可述。他所创立的许多制度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他确立了从地方官吏和平民中选拔人材的察举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规定各郡国荐举孝、廉各一人，此后历年成为定制，孝廉一科就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武帝还多次为人材脱颖而出提供特殊机遇，诏令各地荐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选拔其中优异者。如董仲舒、公孙弘和主父偃三人，就是这样被发现的。武帝把儒学尊奉为官学，按照儒家经典设置经学博士，向弟子授业，建立太学和郡国学，从此儒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居着官方学说的独尊地位。古代的历法，是一件关系全国生产和政治的大事，而汉初以来沿用的秦历，因年久失修，差数太大，无法校正，便命司马迁和天文学家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制定新历，即著名的“太初历”，比以前准确得多，故沿用至东汉。武帝为加强朝廷的统一，进一步打击诸侯王国的势力，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法”，允许诸侯王分封子弟为列侯，从此王国析为侯国，辖地只剩数县，与一般的郡无异，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法与朝廷抗衡了。武帝还设置十三部刺史制度，督察地方二千石官员、郡国守相。

武帝时期的又一重要贡献，是把汉初以来就存在的北方边境游牧民族的袭扰平息了。这是武帝时期，与匈奴进行了长期战争的结果。武帝曾三次命令大将征讨匈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入侵，武帝派卫青领兵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出击，北抵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迂回至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设置朔方郡。其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汉

军也数度出击。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命霍去病自陇西进兵，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这一年夏天，霍去病又由北地出击，越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匈奴受到严重打击，浑邪王率众来降。汉朝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带领大军分别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南）出发，向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在漠北击败单（chán婫）于，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至狼居胥山（今外蒙肯特山）。经过这几次重大战役之后，匈奴力量大为衰竭，已不能向东方发展，仅对西域诸国尚有一定的控制作用。百余年来，北方农业区域所受匈奴的威胁，至此基本解除。汉军在长期作战中也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北方边境地区迁徙来的居民与屯垦的士卒，一起把荒原开垦为耕地，传播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河西走廊地区修起屏蔽交通和生产活动的长城，北方旧有的长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这样，西自敦煌，东至辽东，形成了城堡烽燧互相联结的大规模防卫系统，蜿蜒万余里。长城是阻挡游牧民族侵扰的防线，也是向游牧民族地区传播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纽带。

武帝时期对边疆开发的又一件大事是通使西域和开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当时的西域，主要是指今新疆一带，分天山南、北两路，共三十六国，其中大宛（在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即月氏，音ròuzhī，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乌孙（在今天山北麓伊犁河上游）等国比较重要。汉武帝为了联络大月氏夹攻匈奴，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率随从一百余人向西域进发，他在途中被匈奴俘获，羁留十余年才得率众逃脱，先后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他

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回到长安后，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前后达十余年，历尽艰险，带回了西域的各种情况，也传播了汉朝的影响。元狩元年（公元前121年），汉军大破匈奴，取得了河西地带，从此通往西域的道路不再受匈奴拦阻。两年后，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到达乌孙，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等国的副使，也同这些国家报聘汉朝的使者一起，陆续来到长安。从此，汉同西域的交通频繁起来，这样，天山南北路地区与内地联为一体，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意义重大。中原与西域以至更远地区之间开展了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等特产，良马、骆驼等牲畜，以及西域和中亚地区的音乐、歌舞、杂技等，传到内地，中原的丝织品和先进工具、铸铁等技术，及汉族文化传到西域以至中亚。汉武帝时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有魄力吸收和容纳外来文化的时期，这正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

武帝盛世的又一表现，是人材辈出。汉武帝性格有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专断独裁，如任用酷吏，对臣下责罚极严。另一方面，武帝好贤不倦，受忠直之言。他即位初年，得知山东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儒生申公，便派人用最尊敬的礼节安车蒲轮迎接到京城，向他请教国事；董仲舒对《天人三策》，被武帝尊为儒林首领；公孙弘用《春秋》经义言政事，武帝将他由平民提拔为卿相；主父偃等三人上书，武帝感慨相见恨晚。这些都传为佳话。武帝大量起用贤材，求之如不及，如他在诏书上所说：“欲建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在这种时代氛围下，便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局面。所以史书上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涌现出一大

批杰出人物，儒学有公孙弘、董仲舒、 宽，恭谨忠诚如石建、石庆，直言如汲黯、卜式，文学如司马迁、司马相如，诙谐滑稽如东方朔、枚乘，应对如严助、朱买臣，历法有唐都、落下闳，音乐有李延年，理财有桑弘羊，出使有张骞、苏武，将帅有卫青、霍去病，真是群星灿烂。汉武帝大有作为的时代造就了这些杰出人物，而杰出人物的活动又推动了时代前进！

武帝的另一面，是极度迷信，拜神求仙，冀望长生不死，先后上了“神仙”术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的当，却仍不悔悟。在此影响下，迷信妖雾弥漫朝野，关中以至各地淫祀盛行，方士、女巫遍京城，出入皇宫，教唆宫中美人把木偶埋在地下，施诅咒邪术。此外，汉武帝守边有功，但连年大规模征伐，耗尽文、景时代积累的巨量财富，造成了府库空耗，百姓负担着无法忍受的兵役、徭役和赋税。武帝招贤的同时也任用了酷吏，郡国官吏大多酷暴，各地上报廷尉的大案一年多至千余宗，有的案件株连逮捕达几百人。因此至武帝晚年，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动荡不安，导致山东各地出现了小规模农民起义，多的聚集了数千民众。

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在秉政期间，他深知连年征伐、大兴功业必然引起“民困”、民怨，再发展一步，便要“袭亡秦之迹”，那是汉朝人人明白的大崩溃、大灾祸，他自己也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或许武帝在开始的几十年里还记住了主父偃等三位贤者的告诫，警惕着走亡秦的路，还掌握住一个“临界点”，控制自己，不超出限度，以免引起大乱。到了晚年，他便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继续兴师劳民；或是罢兵息农，挽救危机。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终于当机立断选择了后者，表示幡然改过。当时，桑弘羊等人上奏

说：可在西域轮台实行屯田，募民前赴，以威镇西域。汉武帝特地为此下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对长年征伐造成士卒死亡、百姓重困，引以自责，断然否定了桑弘羊的建议。宣布当今急务是禁止严酷的刑罚和苛重的赋税，重视农业生产，从此不复出军。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休息民力，思富养民，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发展农业生产。

历史证明；汉武帝晚年的政策选择是明智之举，轮台诏标志着他政策的转折。昭、宣时期继续沿着罢兵力农的路线走下去，出现了“中兴”局面。

中 兴

（包括昭帝在位14年，宣帝在位24年，公元前86年——公元前49年）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已到垂暮之年。他已拿定主意让少子弗陵继承帝位。这一年，弗陵年仅八岁，武帝仔细考察近臣的人品言行，最后决定由霍光辅佐年幼的皇帝，但他不明说，而让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公以朝见诸侯的画，亲自赐给他。霍光是大将军霍去病的弟弟，他在宫中侍奉武帝出入已有二十多年，为人沉静，处事谨慎。如今，武帝重病不起，由霍光、金日（mí d 咪低）、桑弘羊等亲近大臣守在身旁。霍光见武帝已到弥留之际，忙问：“陛下百年之后，谁继帝位？”武帝回答说：“我送给你的画，你还没看懂吗？我要少子弗陵继位，由你辅政。”这是汉武帝临终托孤，对于此后几十年政治生活关系重大。

昭帝在位十三年，朝政大权一决于霍光，史家称赞武帝“顾托得人”。霍光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昭帝时期政治局面得以稳定。昭帝年间，曾一再遣使者到各地查问民间疾苦，因自然灾害，下诏救济